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田新文

在新形势下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深广的内涵。文化的定义千差万别,达上百种之多。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我们通常是在狭义的意义理解文化这一概念,但狭义的概念却不能狭隘地理解。“四个自信”里的文化自信,更有其独特的含义,既不可简单地、泛泛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就是指作为文化知识的文化。

文化自信里的文化,包含着五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淬炼而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凝聚而成的先进文化。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根本上就是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当今社会上甚至包括在文化界,一讲到文化自信,认为就是指回到传统文化,回到离今天遥远的古代文化,最后就变成了对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阐释、演绎、背诵甚至竞赛。毫无疑问,五千年中华文化灿若星河,留下了太多值得珍视的文化经典,而且在当代世界无比开放、文化交融越来越密集频繁的情形下,从古老中华文化中汲取养分和心灵滋养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同时应当甚至更应当强调的是,在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应坚持从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滋养。就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始终强调的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其中,“优秀”二字十分重要。对待传统文化应坚持科学态度。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些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进步意义,有些已不能适应新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有的甚至对历史进步、时代发展形成阻碍,必须加以批判和扬弃。我们必须从庞大、漫长的传统文化中挖掘、梳理、提炼出其中的优秀成分,从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要求出发加以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当代中国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目的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现实

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形,为了从一时一地,从一两个“文化名人”身上寻找出吸引人眼球的“文化资源”,把一些封建糟粕做如获至宝般的宣扬,甚至当成“地方名片”大加渲染。一些文艺作品、人物传记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问是非,不辨真伪,片面夸大,造成文化上的乱象,这样的态度不但无益于增强文化自信,反而有害于真正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纠正。

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历经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这一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必修课。我们学习红船精神,就是要从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初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确立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远大理想,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的革命历程中汲取力量。今天,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让全党从我们党建党初期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革命文化中寻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力量。1930年,毛泽东同志面对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对党内论调的悲观论调,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既没有盲目夸大,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机械地规定时日”,更以超强的坚定意志,以对革命形势的科学判断,发出了充满信心的强音。即使正处在革命的低潮期,他坚信革命高潮并非是不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在低潮中看到潜在的革命力量:“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这不是一种诗人的天性浪漫,而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自信。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侵略者的强大武装,毛泽东同志做出这场战争将是持久的而不可能是速胜的,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论断,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义的事业,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屈服,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信。今天,在文化交融交锋

的背景下,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从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战胜面临的困难,非常重要。那些对革命英雄身上凝聚的精神力量采取无视甚至漠视的态度和做法,调侃崇高、消解英雄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批判。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进而肩负起强大的文化自信,这是我们肩负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70年所积累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饱满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待历史要坚持科学态度,不能割裂式地对待历史,不能因为前30年而否定后30年,也不能因为后30年而否定前30年。我们党和国家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与努力,这一进程中的文化力量同样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实现一个又一个航天梦想,现在正朝着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目标迈进,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从钱学森等老一代科学家到今天的航天工作者,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创造的科技成果,汇聚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奉献精神,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来源。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奇迹,我们面临来自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围追堵截”,种种刻意的阻碍和无理的刁难,前进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国内发展遇到了叠加期、换挡期,从高速

度增长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从粗放型发展到“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从国际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实质上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文化的竞争。我们需要提升应对这种竞争和困难的科学的、专业的能力,需要有理性的、从容的态度,需要有开放的、坦荡的胸怀,更需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对和战胜一系列的困难。文化自信这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正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了,“中国人民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我们有自信、有志气,因为有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有从黑暗中战胜强大敌人的革命文化的感召,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成熟的助推,就不会惧怕任何干扰的因素,不会畏惧任何困难,坚信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是口号,不是表态,应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我们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通过学习,我们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迫切性。我们的事业和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责任,肩负着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力量的使命。坚定文化自信任重道远,真正做到坚定文化自信,我们需要破解的难题还很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繁荣兴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完成这些任务,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文化全球传播需要大众文化的成熟

张颐武

从今天来看,中国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方面已经有自己的现实基础和具体实绩。一方面目前我们的文化市场和消费力是全球增长最快、最具影响力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本土文化资源也极为丰富和多样。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当下我们的文化产品和现实的文化状况都还尚不能匹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坚持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内在气质,但另一方面也要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的传播手段和路径,更灵活地注重大众文化的传播,注重大众文化吸引力的打造。

文化传播首先注重路径,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都是这样。首先,大众文化是凝聚人心,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如美国非常擅长利用大众文化进行文化传播,而且效果很好。美国通过大众文化,把自己的价值观等核心理念潜移默化传播给外界。其次,就全球来说,大众文化的传播途径也是最广泛、最基础的。它依靠类似于新的电子媒介、网络媒介这种新兴平台,这些平台都是传播最广、最有效、最有针对性的。同时,大众文化因为有市场效应,会有市场的回报,也就有了一种激励的机制和持续发展的动力,传播效应较好。因此在文化的传播和文化影响力的生成过程中,既要重视高雅文化的传播也要重视大众文化的传播。

如何创造出更多样的蕴含着我们价值观的真正优质的大众文化作品,是当下面对的现实问题。客观地说,我们在世界大众文化领域还不居于主导地位,我们的吸引力、创造力、想象力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现在对新兴国家大众文化传播得比较好,对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还有些局限;我们对全球文化接受的最重要的对象——年轻人的传播还有很大的空间;在调用年轻人喜欢的文化形态方面、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路径上应该更多样。

这些情况的存在当然既有客观的影响也有主观的因素。一是西方主导全球话语权的局面仍然存在,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具体来说,西方在文化传播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在文化传播上的路径比较多,手段也比较多。二是西方制定规则。在文化市场准入方面,西方制定了一些复杂的规则,有一些复杂的技巧。西方有很多准入门槛,有很多策略上的安排让其不用专门防你,你都很难进去。这些复杂规则的很多门道还有待深入掌握。三是最近由于我们的文化传播影响比较大之后西方开始警觉。警觉以后西方采取了一些对策,对我们的文化传播采取某些直接封堵的策略。四是我们的文化产品生产虽然已有许多实绩,但和现实的要求还存在距离,还要提升。

文化的全球传播需要更灵活的方式和更多样的路径。这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首先要对对方的需求有更多的了解,对于受众有更多的体察,这不能想当然,不能我们认为好的,我们就要传播给对方,对方可能不这么认为。我们要对对方的需求有了解,然后进行柔性地传播。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减少所谓的文化折扣。因为文化差异,文化传播总是有折扣的。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有不同差异,文化传播时要找共同点,找能够沟通的途径。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寻找共同点,避免折扣太多。比如,我们很好的一些民族艺术在国内非常火,但走出去的时候对方很难理解。我们的这些民族艺术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共通的文化背景很难理解。所以,我们要找共同点避免折扣。

第三个方面,要重视传播的细

节。在传播的路径方法上,要有更多的新思路,就是说要对对方的传播思路熟悉,对对方社会所习惯的一些思维方式理解,要顺其自然,然后才能达到我们传播的效果。要坚持传播的效果导向,不求完成度最高,而求效果最好,找到效果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路径。我们不求改变对方的整体想法,而是让对方接受我们的想法作为参照。文化传播要特别注重度,要使巧劲儿。文化传播讲究刚和柔结合,广和深结合,大理念和小故事、小环节结合。我们在强、大、广的方面比较好,但在深、柔、小方面还有努力的空间。如对于寓教于乐也要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光是教化也不行。文化的全球传播需要久久为功,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文化传播不是简单的事,需要更丰富的手段、更丰富的路径、更多的方法,需要通过多样的路径方法,多层次、多趣味的方式展开。只有在传播方法上更弹性更有活力,路径上更多样,思路更开阔,对外传播才会达到最优化。着力于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领域里多方面的发展,让大众文化始终保持其旺盛的活力。没有喜闻乐见的吸引力,大众文化的国际影响和国内传播就不会真正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更多的耐心和长期的扎实努力,也需要对于大众文化的发展给予更多的激励和更多的支持。关键还是既要坚持开放,又要坚守我们的核心理念,核心理念一定要和开放的思路、开放的方向、开放的路径结合。

科技发展,助力艺术创新

吴士新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迅猛,令世人瞩目。5G、纳米、“中国天眼”、高铁、深海探测、探月计划等,中国科技已步入世界领先的行列。科技的发展、革新不仅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也为艺术创新打开了空间。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到今天方兴未艾的现代工业革命,几乎每一次科技发展、进步都会推动新的人文价值观念与新艺术创造的产生。数学、几何知识的发展,催生了以和谐、数量、秩序为基础的西方古典主义写实绘画。而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欧洲人对光谱的发现,产生了印象派、后印象派。20世纪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录影艺术应运而生。

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有天然的朴素的美感色彩。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宣纸、毛笔、水墨等工具、材料的发明,是中国画及其美学物质基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普及有力

地推动了文化、艺术教育的大众化传播。宋代画家在宋代理学的倡导下,使绘画成为深入探究自然事物存在真相、体悟自然事物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造就了宋代绘画的高峰。

科学上的新发现总会导致人们认知的改变,而技术上的进步则不断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从物质微观世界探索到宇宙宏观世界的探索与研究,揭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不断刷新人类对世界已有的认知、观念。可以说,科技发展不仅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新材料、新手段,也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新观念、新方法,为艺术发展注入了经久不衰的动力。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的进步,造就了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艺术、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光效应艺术、极少艺术等,这些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科技与艺术融合的过程也是人文度量、价值准则重新生成的过程。它拓宽了艺术与生活的生活,让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审美与

非审美之间摇摆不定。如今,编程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用于音乐、诗歌、绘画、舞蹈、棋类等。2016年3月,融合了神经网络、深度学习、蒙特卡罗树搜索等技术的“阿尔法围棋”成为第一个击败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2018年10月,在佳士得纽约拍卖会上,由人工智能通过新算法创作的肖像画《爱德蒙·贝拉米的肖像》拍出了43.25万美元的高价,开启了人工智能艺术拍卖的先河。可以说,科技发展不仅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新材料、新手段,也为艺术创新提供了新观念、新方法,为艺术发展注入了经久不衰的动力。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的进步,造就了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艺术、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光效应艺术、极少艺术等,这些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那么3D打印技术让万物复制成为现实。科技与艺术相互融合,以一种嵌入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自动驾驶、智能泊车、360度全景雷达系统、智能家电、智能手机、人脸识别、智能机器人等,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不过,虽然我们习惯于沉浸在科技创造带来的便利与喜悦之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科技的发展亦有其负面之处。过分地强调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理性主义,也将产生潜在的风险。科技发展如果不受道德伦理约束,将违背科学之为人类服务的初衷。例如,由现代工业化生产原因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造成的争议也并未平息。

在新时代如何将科技发展真正转化为艺术创新的动力,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5G时代为标志的新科技时代的到来,一个蓬勃发展的艺术创新时代即将到来。

很多大众文化现象并不是自然而然地随着大工业化的进程而发生并发展的,相反,有不少大众文化往往发端于个体,尤其是个体的反抗行为。比如,牛仔裤,特别是被故意磨旧、打洞、截短后的牛仔裤。怪异着装、长发披肩在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是部分青年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表示,这种充满个体愤怒情绪的象征很快被转化成了商品,你尽可以通过花钱购得这种象征物以表达你的怨恨。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大众文化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里已经得到人文研究学术界的很多关注,成为“文化研究”理论表现其魅力和力量的重要阵地。大众文化研究反过来可以深入体悟“文化研究”的含义,进而了解文化如何在大众也即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大众文化批评的路径其实是分析了由大众而社会再到大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的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而这种发挥也是让商品变成符号的过程。这是大众文化批评的认识意义所在。

金衡山:《我们时刻呼吸着的大众文化》,原载于《文汇报》

观点摘编

中国文论“走出去”离不开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同样也离不开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以及中外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中国文论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谱系,如何在翻译中对传统文论话语进行语言转换,需要充分考虑接受语国家的文化语境、诗学传统及审美规范等因素。文本翻译是一个意义无限延伸的开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文不断被研究、翻译、阐释。其中,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断碰撞、理解、融合,源语文化的内涵也能得以彰显。

中国文论内涵丰富、表述凝练,这就需要译者以规范的外语及译入语读者容易接受的形式,将其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出来。在古代文论外译的过程中,文论术语的翻译尤为重要。国外学者要深入理解中国文论,必须掌握中国文论的基本术语。中国学者如果想要向国外介绍和传播本国文论,并与国外学者展开有效对话,也必须首先把古代文论术语准确翻译出来,并阐释清楚。对文论术语的真正理解,会促使国外学者加深对中国文论独特性的认识。所以,中外文论话语间的对话,是从基本文论术语的翻译和相互理解开始的。

戴文静:《中国文论“走出去”路径探析》,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明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首先,在文学理论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仍居主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兴起。其次,在当代文学思潮方面,学界围绕当代文学创作展开了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研讨,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工作日益活跃,学界开始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新兴媒介所引发的许多新文学的现象受到关注。再次,在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研究持续升温并引发“细读文本、重回经典”的学术思潮,横向的共时性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开始关注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港澳台海外华文文学,综合文献研究以系统整理史料工作为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最后,在文学普及工作方面,选编历代文学经典作品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回顾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学术工作者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刘跃进:《中国文学研究四十年思潮》,原载于中国文学网